

木头的「刺猬爬树」

◆ 童孟侯

我有点“木头控”，到哪里去旅行，都喜欢背点原生态的木头疙瘩回来。

2013年的秋天，我和大桑一起到安徽李坑玩，在经过一个卖木雕的商店时，看到架子上放着好几个树瘤，大大小小，奇形怪状，很是可爱。可是，每一个树瘤的顶部，都被店主挖了一个深深的洞，意思是这个树瘤可以当笔筒。于是，天然的树瘤变成了实用品。

我拿起一个还来不及被店主改造成笔筒的树瘤，细细欣赏，先近看，再远看，再正看，再反看，终于琢磨出一些道道来。你看，它的正面不是一只正在爬坡的刺猬吗？这件“作品”可以命名为“小刺猬”嘛。它的背面更精彩了，可以命名为“凤凰涅槃”，一只“凤凰”正在火中挣扎，腾飞，它的四周烈火熊熊。

我窃喜，但我不想表露出来，于是装作漫不经心打听价格。店主说：280元。我立刻放下树瘤，并给了大桑一个眼色。大桑说：老板，这种树瘤我家里有三四个，都是在江湾买的，那时候买的30块一只。

店主说：不可能，我几年前就是在江湾开店的，几年前也要80块一个。

大桑说：你现在要加200块？树瘤又不是艺术品，你从树上割下来就行了。

店主知道自己说漏了嘴，便说：150块拿走吧。

晚上回到宾馆，我便开始伺候这樟树的树瘤，先给它好好擦了一把热水脸，然后用牙刷把树缝中的脏物都剔出来。看见宾馆提供给旅客一小管润肤露，我就把它挤出来，把树瘤的上上下下前前后后都抹了一遍……折腾了大半夜。

第二天，大桑见到这树瘤时，惊异道：它已经是一件艺术品了。雕塑还要煞费苦心雕啊挖啊，它呢，只要洗把脸，涂一点润肤露，就脱胎换骨了。

我家还有一根树干（也许是树根），我记不得是哪一年买的，当时摊主说是野山楂，我搞不清是野的还是家的，也搞不清它是藤类的还是别的类的植物，只是觉得这一根木头既具有一种扭动的一路向上的条纹，又有沧桑感，非常耐看。于是就买下了，背回了上海。

一件普通的东西，往往可以发掘出美来，同时发掘出自己的好心情。更不要说那些天然的树干树枝树瘤树根，它们的纹理、走向、色泽……只要取材得当，兴许能发掘出它的巧夺天工，兴许能让它成为有艺术感的玩意儿。我们在端砚上发现了“眼”，我们在黄花梨上发现了“眼”，我们在宝石上发现了“猫眼”，顿时，这些天然的东西便灵动了，精彩了。

如今，我把这根树干和这个树瘤放在一起。朋友浩明来了，我便介绍说：这两样放在一起是绝配，一只大饼一根油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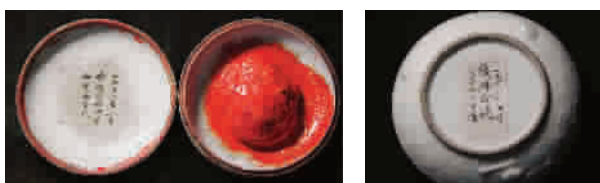
浩明说：你比喻得文雅一点好不好？一个是豪放派，一个是缠绵派，两个组合，就是“刺猬爬树”。

哦，名字起得好，“刺猬爬树”，尽管真正的刺猬不会爬树。



《鲁庵仿完白山人印谱》手工钤拓本

◆ 华振鹤



接到符海贤先生电话，今年是他父亲符骥良老先生逝世三周年，有关方面将举办他的书法篆刻展，要我参加。符老是著名书法篆刻家，又是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鲁庵印泥的第二代代表性传承人，生前与我相交颇深，这个活动当然得参加。开幕那天，果然群贤毕至，气氛隆重热烈。

之后不久，我来到海贤寓所，回忆起符老诸多的艺术成就，以及他与沈鹏、唐云、钱君匋、田叔达、丰子恺等艺坛名家的交往。我们不约而同地说起，其中对他影

响最大的，无疑是张鲁庵。

张鲁庵（1901-1962），浙江慈溪人，名咀英，字鲁庵，斋名望云草堂。他毕生从事印谱和名印收藏、印泥制作、篆刻创作，其印泥更是蜚声书画篆刻界，被称为鲁庵印泥。1955年，他与王福厂等发起成立上海金石篆刻社，任社长，张为秘书长，当时年富力强的符骥良是秘书助理。就是在那里，符老学到了全部鲁庵印泥制作技艺，并建立了亦师亦友的深厚关系。

说到这里，海贤从书橱里拿出一本《鲁庵仿完白山人印谱》手

工钤拓本给我看，印谱完成于1942年，由当地名儒张原炜撰序后请书法大家谭泽闾书写。

原来，张鲁庵治印，初学西泠诸家，后来专攻邓石如一路，尤其欣赏他“以书入印，印从书出”的篆刻风格。由此也注意搜集印章实物、印蜕和印谱。邓石如，号完白山人，一代印学大师。他刻印虽多，流存下来的却很少。张鲁庵多方重金搜求，仅得61枚并据此摹刻袁成一帙，其目的诚如张原炜序中所说，在于“标正宗，饷后学，意至善也”。

海贤边翻印谱边解释，邓石如治印，摆脱了当时印坛流行的工整精致风尚，开创了洒脱自由、抒情写意的印风。张鲁庵摹印，很

好地保留了这一点。

《张鲁庵仿完白山人印谱》还有个特点：使用了张鲁庵特制的复硃印泥。说着，海贤又拿出一缸印泥，缸盖后背贴着鲁庵手书的纸条“复硃印泥”（见图）。一九四三年用于仿完白山人印谱。虽然是七十年前旧物，至今依旧颜色鲜艳，泥质细腻有光泽。海贤介绍，所谓复硃印泥，也是鲁庵印泥一个品种，即在朱砂中再加朱膘，使颜色更显沉着，用它来钤盖印谱，自然是锦上添花了。

张鲁庵先生1962年过世后，家人按照遗言，把他珍藏的大批印章、印谱等极具价值的文物捐献给了西泠印社，这本《张鲁庵仿完白山人印谱》和复硃印泥，则是他生前馈赠给符骥良老先生的，见证了两位老艺术家相投的艺术志趣和承上启下的艺术传承。

忆一场简朴而名人雅集的婚礼

◆ 沈祖灼

整理旧物，见一张六十多年前的结婚照及其结婚证书，新郎新娘是两位画家许士骐教授和贝聿昭女士。

新郎许士骐教授早年留学法国巴黎美术学院，融西洋美术之精华于国画之传统笔墨，擅长山水、花鸟、走兽等画，曾应徐悲鸿先生之邀和张书旂、陈之佛教授等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新娘贝聿昭是贝家大房的长女，所以我叫她大阿姨，虽从亲戚关系来讲不算很近，但结婚时她确实是在我家出阁的，因此印象就很深刻。贝家是苏州的名门望族，我外祖父赵邦彦家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书香门第，但我的大外婆（我亲外婆是大外婆去世后的填房）与大阿姨的母亲是海盐陈家亲姐妹，因此我叫我阿姨是对的，不过我家住在上海，若不是8.13日寇入侵，我们也许不一定会有来往。后来苏州沦陷，贝家拥有的名园狮子林被日寇侵占，全家四散逃难，她这一房由老母亲陈宜寿携带三女一子辗转逃来上海（此时大阿姨的父亲已去世），在法租界姚主教路（现天平路）“大同坊”租得一个三层楼面住下。因我家也住在姚主教路上的“茅馆”，相距咫尺，远亲顿时变成了近邻，分外亲切，因此而过往甚

密，其时我还很小，妈妈常带我和妹妹去玩，叫一声“大同坊好婆”后一定有糖吃。抗战胜利后不久，我叫他“叔叔”的舅舅（贝“背”娘娘这称呼为苏州人所忌）要结婚，为让出三层正房做新房，小阿姨与老母同住亭子间，二阿姨远嫁去了广东，母亲便邀大阿姨搬到我家三楼亭子间暂住。大阿姨贝聿昭，字坚白，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早年毕业于苏州女子职业学校美术专科，并先后师从国画大师郑午昌及吴湖帆习画山水画。住在我家时，她白天在上海市银行工作，下班后便潜心作画，把亭子间兼作画室并雅称为“海上坚白楼”。

婚礼于民国37年（1948年）11月14日下午在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1800号的“世界社”举行，它离我家很近，步行也只需十分钟左右。那天上午，住在“大同坊”的新娘家人除老母亲外都先来我家与我母亲一起替新娘化妆和穿结婚礼服，花童是由新娘的外甥女担任，所以也在我家换穿礼服，很有些喜庆气氛。当时还是小孩的我和妹妹则非常起劲地跑上跑下轧闹猛，我妹妹还不时去摸摸几天前就挂在大阿姨房内的婚纱。午饭后，新娘先上三楼向我的祖父母告辞，接着新郎派车来接新娘及花童去世界社礼堂，我记得嫁妆是一个皮



箱，除细软外大多是大阿姨的山水画作品及画画用的文具。当时父亲正在美国，母亲则带了我俩去步行去参加婚礼。

世界社是由辛亥革命时的同盟会会员、中国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李石曾等所办的一个文化教育组织，是一幢三层楼的古典式洋房，正门要步上十多级石阶才能进入前厅，气派很大，但不是一个举行婚礼之类的公共场所，正是因为李石曾（二排左）亲自担任证婚人，婚礼才会世界社举行，当时他还隆重地穿上了蓝袍黑褂国服；另一位证婚人是辛亥革命先烈陈英士的胞弟、民国政要、军事家及银行家、总统府国策顾问陈藹士（二排右）。介绍人是

富贵竹平圆紫砂壶

◆ 观复

杂件兼藏，但很快，他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紫砂壶收藏。

孙先生说：“我有时到老画家那里去，往往看到他们手捧紫砂壶冲茶，高雅的举止让我好生羡慕。慢慢地我发现紫砂壶造型美观，形态千变万化，壶身、壶盖、壶柄的不同形态，能组合出无穷造型，使人眼花缭乱。这种美感和由此引起的精神享受，是促使我花时间、精力进行收藏的主要原因。另外，宜兴不比景德镇，离上海较近，来回方便，价格又相对不高，正符合我的实际承受能力。”

此后二十多年里，孙正伟几乎每个月都要去宜兴选壶。他回

忆，那时的宜兴，只有一条狭窄的小街，两旁分布三四十家门面很小的陶器店。街上冷冷清清，行人很少，来买壶的人更少。

在这否定一切的特殊社会环境里，几乎无制壶名家，更没有职称、头衔一说，即使紫砂壶价格低得不可思议，也不会有人想到收藏。孙正伟根据自己爱好，从中挑出造型美、壶身亮丽、制作精致、价格不太高的紫砂壶买。

孙先生告诉我，幸亏当时不断有报刊发表他的画作，有点稿费，从事造型设计也有点“外快”，



加上自己省吃俭用，还是有能力继续收到一批藏品的。

到了本世纪初，随着艺术市场的兴起，他开始关注书画行情和拍卖情况。在拍卖图录中，他惊奇地发现，原来紫砂壶行情竟如此火爆，而周桂珍还是位蜚声海内外的制壶工艺美术大师。他感慨地说，收藏真的是有运气靠机遇的。